

从金代女真贵族墓葬看女真民族汉化进程

李玉君¹, 吴东铭¹, 夏一博²

(1. 辽宁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81; 2.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 天津 300071)

摘要:金王朝是由北方少数民族女真族建立的政权,有金一代,上到女真贵族,下到普通百姓,都极力地效仿学习汉族文化,女真人死后的葬俗也逐步向中原葬俗演变。本文通过对东北和北京地区金代女真贵族墓葬外在形制与内在构建嬗变的分析,展示有金一代女真民族在葬具、葬式、随葬品和丧葬理念等诸多方面不断融入汉文化的历史演变进程。特别是在政治中心迁入中原地区后,贵族墓葬中龙、凤、云纹的使用、“堪舆”学说的运用、昭穆制度和“众生必死,死必归土”观念的认同等等,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关键词:金代;女真墓葬;文化认同;汉化

中图分类号:K8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51(2013)06-0918-06

女真族肇兴于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伴随着民族交融的浪潮,以武力征伐占领了包括广大汉族地区在内的地区,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金王朝。金朝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女真族显现出不断向汉族及汉化程度较高的契丹族在思想文化方面学习、交流和借鉴的姿态,并展现出汉化的趋势。欲知金文化的汉化趋势,则需知其源头、寻其滥觞,从最为原始的女真习俗入手,在其纵向的发展流变中,探寻其汉化的点滴。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墓葬往往能体现一个民族最为持久的习俗。因此,笔者试图通过墓葬这一民族风俗文化的载体,探寻女真民族的汉化进程。

一、东北地区与北京地区女真贵族墓葬的特点

通过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在金代的统治范围内发现了大量的女真墓葬,其中,绝大多数金代女真贵族墓葬集中发现于金源地区以及海陵王迁都后的

中都地区,即现今我国的东北地区^①和北京地区,其他地区目前能确认为女真人墓葬的个例则较少。所以本文以这两个典型的地区,探讨其中贵族墓葬的特点,并从墓葬特点的分析中,探寻女真民族尤其是上层的汉化趋势。

(一)东北地区女真贵族墓葬的特点

东北地区是女真人的发源地和主要聚居地。金朝建国到海陵王迁都以前(1115—1152年),女真人主要居于此,即金源地区。与此相应,女真人的墓葬在这一时期也多集中在此,呈现出明显的女真民族原有习俗特征,较多地保留了女真族的丧葬习俗。并在其中表现出些许的汉化痕迹。据考古发掘报告可知,墓中大都有表现墓主人身份地位的首饰、服饰、鞍具、兵器和铁器等随葬品,随葬品的质地与材料则因之而异。

关于女真人旧时丧葬习俗,史料并不多见。“死者埋之而无棺槨,贵族生焚所宠奴婢、所乘鞍马以殉

收稿日期:2013-06-1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1CFX011);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一般项目(W2011052)

作者简介:李玉君(1980-),女,吉林梅河口人,辽宁师范大学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辽金史、东北地方史研究。

之”^{[1]卷39},应该指的是女真民族的旧俗。这种习俗可以上溯到其先世的乌桓、靺鞨时代,如《后汉书》记乌桓族葬俗云:“俗贵兵死,敛尸以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则歌舞相送。肥养一犬,以彩绳纒牵,并取死者所乘马、衣物皆烧而送之。”^{[2]卷120}《旧唐书·靺鞨传》谓:“死者穿地埋之,以身衬土,无棺敛之具,杀所乘马于尸前设祭。”^{[3]卷199下}

纵观整个东北地区,土坑墓是始终存在、长期使用的一种主要墓葬类型,使用者主要是平民,起初不用葬具,直接采用天然土坑下葬,“多数仰身直肢”^{[4]317}。绥滨三号辽代女真墓不规则的土坑墓形制可以看做是此类墓葬的代表^[5]。这种墓葬形制代表了女真族旧有的丧葬习俗,其特点是以竖穴土坑墓为墓框。而后,发展了使用木棺(个别的有椁)、陶罐(装骨灰)和石函等多种葬具,在完颜希尹家族墓地中则普遍使用石棺、石函和木棺^[6]。随葬品以铁器、武器、工具和陶器为主,其间也常见不少具有女真特色的随葬品,如“嘎拉哈”和桦皮桶^[7-9]。完颜娄室家族墓地^[10]、完颜晏墓^[11]也都沿用了土坑墓这一传统墓葬类型,普遍采用了竖穴土坑墓。

从埋葬方式上看,这一时间位于金源内地的女真人早期多用土葬,这种葬俗由来已久,据上文引证,在早期,火葬不受女真人重视。火葬只是用以殉葬的奴婢和所乘之鞍马。从土葬和尸骨葬来看,金代女真贵族多采用尸骨葬,但绝大多数木棺内没有保存下完整的尸骨,仅有完颜晏墓保存了完整的尸骨及其衣物,墓中“男性着8层17件,女性着9层16件”^{[11]3},由此,我们推测女真贵族中采用尸骨葬者应有一部分人在下葬时有多重衣物裹身。这种多重衣物裹身的埋葬方式即裹尸墓葬,既体现了墓主人的尊贵,又在一定程度上对尸体起到保护作用。目前所见较早也较为成熟的裹尸墓葬是长沙马王堆1号墓,由此观之,笔者以为,汉文化的厚葬之风对早期女真墓葬不无影响。

从墓内陈设来看,金代早期东北地区墓葬中摆放的具有特定含义的物件应当为买地券。如完颜希尹家族墓地第二墓区M2出土的铁券,有可能就是宋元时期较为流行的买地券^{[6]65};齐国王完颜晏墓在棺盖板中部摆放了“银铭牌1件,平面近似扁平幢形”^{[11]8},此银质铭牌也应同样具有买地券的性质。

从随葬品来看,金代早期东北地区女真墓葬中随葬品便有汉式器物,这些器物应是战利品。如石宗璧及妻纥克石烈氏墓中出土了多件定窑瓷器,瓷器中既有如鸡腿瓶、瓷瓶等陈设用瓷,也有如瓷碗、瓷杯和瓷小碟等日常生活用瓷^[12],充分证实了汉族及汉化程度较高的契丹族生活器皿,已经融入女真民族生活这一事实。

综上所述,女真在金王朝肇基草创的初期,保持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只是在与汉民族有了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后才对其墓葬进行了些许的修饰和补充,但不论从规模上还是程度上,都不是很大,这与金代中后期的墓葬特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北京地区女真贵族墓葬的特点

海陵王完颜亮迁都之后,金朝政治中心南移,大量女真贵族随之南下,进入华北和中原。金中都(今北京地区)即成为女真贵族的又一聚居地,其周围发现较多的女真贵族墓成为这一情况的有力佐证。

就墓葬形制而言,北京地区的墓葬主要可分为土坑墓、土坑砖室墓、土坑石椁墓、砖石混筑墓四大类型。但“其中以石椁墓和砖石墓的数量为多,前者以长方形为主,后者以圆形居多。”^{[13]28}

金代北京地区的墓葬特点在前期和中后期也有着较为明显的变化。“圆形单室砖墓是前期最主要的墓葬形制。”“到了金中期,土坑石椁墓成为主流,且墓主大多是女真贵族,石椁的制作较为考究。”^{[13]28-30}

较之金源地区,北京地区的金墓呈现出更多的墓葬类型,这固然有随时间流变发展变化的影响,但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则应是女真民族汉化程度加深的结果。

金代北京地区的民族构成沿袭了辽代的以汉族为主的情况,其间夹杂有契丹、渤海和女真等民族。但在金前期,由于统治中心在金源地区,北京地区仍旧保持着辽氏的民族构成,女真没有改变其在当时北京地区人口总数上占有较小比重的现实,故而占人口较大比重的汉、契丹等民族对于当地女真人生活习俗的影响也很深刻。这一时期女真墓葬中随葬具有汉、契丹民族特色的随葬品便是很好的佐证^[14-16]。

随着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的实行,金中都逐渐发

展成为北方各族人民汇聚之地和金王朝的政治中心。

而女真民族越来越多地迁入华北地区,并与汉族及汉化程度较高的契丹人杂居、通婚,加之人数较少于汉、契丹等族,在墓葬实体上和丧葬习俗上越来越多地借鉴汉文化因素也就自然而然了。金代皇陵在先葬金源、后改葬、聚葬于北京大房山地区的过程中,最为明显地体现了女真进入中原后,与汉及契丹民族杂居、共处乃至通婚并受其影响,借鉴和融合汉文化这一趋势。

二、金代皇陵葬俗的嬗变

金代皇陵经历了一个地域上的变更,金前期的两位皇帝太祖、太宗以及始祖以下十帝的皇陵原皆葬在金源故地。金太祖在天辅七年(1123年)死于部堵冻西行宫,葬于上京宫城西南,建宁神殿,无陵号。金太宗在天会十三年(1135年)正月死于明德宫,二月建和陵,将太祖迁和陵,太宗也在三月下葬和陵。金熙宗皇统四年(1144年)撤去和陵称号,以太祖陵为睿陵,以太宗陵为恭陵。即“虏人都上京,本无山陵。祖宗以来,止葬于护国林之东,仪制极草创。”^{[1]附录二·山陵}

如前所述,金初的墓葬制度也许还没有形成定制,皇陵可以轻易改葬与更名,对于首领的丧葬问题,女真人还是较为习惯地采取了女真原始葬俗,而没有采取过多的具有汉文化特色的葬式和葬仪,因而较之于其后来金帝陵墓,显得过于草率与随便。笔者以为,金王朝从崛起到依靠武力征伐占领秦岭——淮河以北的辽、北宋故地,基本确定金版图,仅仅用了16年时间。可以试想,女真这个民族用如此短暂的发迹时间来完成对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帝国的营建,青壮年男子必然皆勤于戎事,无暇对首领的身后长眠之所投入过多,所以因循旧制。这也许也是金前期皇陵较之于同为北方民族出身的皇帝辽太祖等人恢宏博大、颇具汉唐遗风的帝王陵逊色不少的一个重要原因。

继太祖、太宗和熙宗之后,金王朝的第四位皇帝海陵王完颜亮登基称帝。海陵王身份特殊,他不是通过合法的皇位继承程序获得皇位的,而是通过弑其君兄熙宗而篡得皇位的。也许是慑于金源内地宗室和贵族势力,即位以后,他一方面开始了对宗室勋

戚的大肆屠戮,从而使得宗室勋戚人数殆尽,对他的反对之声日渐低迷;另一方面,海陵王启用异族官吏居于要职,扩大其统治基础,巩固统治,并着手准备迁都中都的事宜,并于“贞元三年(1156)三月乙卯,命以大房山云峰寺为山陵,建行宫其麓。”^{[17]卷5}大房山金陵便是其汉化政策的一个实物体现。大房山金陵是海陵王将太祖、太宗、父、叔之陵及始祖以下十祖陵一并迁至中都集聚安葬形成了最初的规模。“五月乙卯,命判大宗正事等官员到上京,奉迁太祖、太宗梓宫;六月乙未,再命右丞相仆散师恭、大宗正丞胡拔鲁到上京奉迁山陵;九月丁卯,海陵王亲迎梓宫于沙流河,途中亲射獐以荐献梓宫;十月戊寅,致奠梓宫于东郊,己卯,梓富到达中都,以皇宫正殿——大安殿为‘丕承殿’安置;十一月乙巳朔,梓宫自丕承殿出发,戊申,太祖、太宗等梓宫安葬于新陵,陵名依旧,”^{[17]卷5}大房山开始成为金朝的皇陵区,后熙宗、世宗、章宗、睿宗、显宗等也陆续葬于此地,形成了今日所见的规模。虽然大房山金陵修造时间较短,诸陵采用同一兆域,修建规模远不及汉唐皇陵的一帝一陵的规格,但已经在许多方面体现出了浓厚的汉族皇陵的传统文化因素。

(一)金陵的外部构建

“堪輿”之法即风水之术。堪輿本有仰观天象,并俯察山川水利之意,后来逐渐发展成为相宅相墓之法,因民间将看风水之人呼之为“堪輿家”,故而民间的堪輿与看风水近乎于等同。堪輿在宋代臻于成熟并流行开来,其主要表现是上至帝王,下到黎民,对堪輿之法都极力推崇,河南巩县的北宋皇陵更是完全按照堪輿学说选择皇陵的地点。

大房山金代皇陵主陵区,位于今北京市房山区九龙山,其地形、地貌体现了浓厚的堪輿学痕迹,海陵王迁都后在先皇陵寝的选择上,完全吸收了汉人创造和使用的相墓之法。金陵的主陵——太祖陵,坐落在九龙山主脉与影壁山,所处的罗盘子午线上。在九龙山主陵区的东面山冈、西部山包,构成了堪輿学中的“青龙山”和“白虎山”,属于皇陵的“护砂”。九龙山北接连山顶,根据堪輿学理论,有明显的“行龙”痕迹。追山脉逆推,可见明显的少宗、少祖、太宗、太祖等诸陵,九龙山又低于连山顶,符合堪輿学所谓“玄武垂首”说。九龙山西北侧山谷中有泉水涌

出,向东南流淌,千年不断,亦是明显的皇陵水砂,符合堪輿学所谓“朱雀起舞”说。以上这些应该都不是偶然,应为开山造陵之时有意为之,金陵地点的选择应该是采用了北宋的主流堪輿学说的观点对皇陵进行修建,这是女真墓葬对汉文化进行吸收和运用的一项重要体现。

传统汉族王朝的皇帝为了表现君权受命于天和以皇权为核心的等级观念,包括宫殿建筑和皇陵地上建筑,在内采取严格的中轴对称的布局方式。中轴线上的建筑高大华丽,轴线两侧的建筑低小简单。这种明显的反差,体现了皇权的至高无上;中轴线纵长深远,更显示了帝王宫殿的尊严华贵。大房山金陵在陵区的布局原则上,同样采取了同于中原诸王朝的传统布局方式,“陵区神道虽然不是正南正北走向,但是陵区内的台址(t1~t4)、殿址(F1、F2)都是以神道及其延长线为中轴左右对称布局的。”^[18]

昭穆制是我国古代的宗法制度,指宗庙、墓地或神主的辈次排列,具有象征尊卑上下,表明长幼辈分的礼法作用。金代大房山皇陵严格地遵守着“昭穆有序”的礼法制度,如史料记载:“至筑陵之处,亮寻毁其寺,以奉安太祖炆、太宗晟、父德宗宗干,其余各随昭穆序焉。”^[1]实地调查也会发现:太祖睿陵作为开国之君居于中央昭一之位,其祖辈、父辈——始祖以下十帝皆葬于其北部山上,太宗作为其同母弟、顺位之君,“其(指太宗晟)帝陵恭陵位于睿陵东侧”;德宗完颜宗干^②为太祖庶长子,“其顺陵位于睿陵西侧”;睿宗完颜宗尧作为太祖之子,“其景陵位于睿陵东南侧”;世宗完颜雍作为太祖之孙,“其兴陵位于睿陵西南约70米处”^[18]。结合史料与实地发掘不难看出,昭穆制度已经融入到金陵的整体布局过程中了。

由上观之,不论是从文献还是考古中都不难发现,金代皇陵制度的汉化特征已经非常明显的表现出来。

(二)金陵的内部特征

2002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位于九龙山下此前疑为祭祀坑的一处蓄水岩坑进行了清理,发现四具石椁,其中两具分别会有龙纹和风纹,并考定岩坑下为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睿陵地宫^[18]。

现已考定的睿陵地宫(M6)形制为石圪竖穴,平面呈长方形,四壁为麻岩石凿穴而成,墓葬形制为石

圪石椁木棺墓,石圪内共葬有4具石椁,其中M6-1, M6-2是青石素面椁,南北向放置于地宫两侧, M6-3, M6-4为汉白玉雕凤纹、龙纹石椁,东西向放置于地宫中部偏北。

睿陵地宫中M6-3、4在石椁上雕刻的龙凤雕刻纹饰以及汉白玉雕龙石栏板的显现,更为女真墓葬的汉化提供了佐证。龙是中原各个汉族王朝的皇族象征,女真对于龙图腾的认同,自有其为巩固统治的政治考虑,但,毋庸置疑的是,接受龙作为自己的皇族象征,本身就是一个汉化的表现。龙凤图镌刻在先帝身后的长眠之所,显然已经超越了仅就政治目的考虑这一狭隘认识,而是对汉民族文化思想的笃信的表现。

金代女真贵族墓葬主要有尸骨葬和火葬两种埋葬方式。火葬在女真人的埋葬方式的选择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但火葬方式并没有得到皇室的推崇,从M6墓葬中保存的尸骨遗体来看,金王朝的统治者无疑都选择了尸骨葬,这与中原王朝的帝王们近乎于全部采取尸骨葬的丧葬方式如出一辙,笔者以为,这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复制与仿效,而是具有更深层次意义上的对于“众生必死,死必归土”^[19]的汉族丧葬文化的认同,甚至是对汉族人民的生活习惯以及慎终追远的伦理情感的认同。

M4和M5^③虽作为睿陵的陪葬墓,但出土的随葬品却很有价值。M4出土了一柄铜首铁剑和一件石枕;M5北端棺床下有一圆形小腰坑,直径30厘米。其内放有一个上扣1件大碗的磁州窑龙凤纹瓷罐,罐内装有一件三角形铁饰和39枚“泰和重宝”铜钱。

随葬品在一定程度上是墓主人精神信仰的物质体现,也是身份、等级的象征。海陵迁葬祖宗、父、叔的梓宫于大房山金陵,时值金代由初期向中期过渡阶段,这时段生活在中都附近的女真人已经逐渐适应并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汉式定居生活方式,而随葬品中的铜钱不乏汉文化之中的厌胜、镇墓的含义,加之“腰坑”在金代皇陵中的出现^[15],这些都是女真人对汉人丧葬习俗的学习与运用,是其汉化的又一重要体现。

女真皇族墓葬从初期随意临都城而葬、更换陵号到逐渐形成定制,仿效中原王朝的皇陵,“堪輿”测定,开山造陵,规划布局,并按照昭穆有序对历代皇

帝进行安葬,其丧葬理念中已经深深地打上了汉族丧葬文化的烙印,其皇陵内部从形制、葬式到随葬品的精神载体的显现,也从细微之处显现出女真在丧葬一域乃至多个方面愈来愈明显的汉化趋向。

三、女真贵族墓葬汉化趋势分析

对于金代女真墓葬的特征、演变及其所反映的女真人汉化问题,结合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笔者欲论及以下几点:

第一,金代早期金源地区墓葬的汉化早期表现在固化的随葬品器物之上,这也许和宋辽、辽金和宋金的战争关系有关,女真人从这一环境中攫取大量的汉人器物充实自己的墓葬。

第二,石质棺椁(或石椁木棺)的使用在女真墓葬当中最为普遍和频繁,并且从金代早期竖穴土坑无室墓占主体到金代中后期土圻石椁墓成为主流,女真贵族墓葬经历了一个棺椁间隙逐渐增大、由无室墓向有室墓转变的过程^[20-22]。

第三,火葬是为女真民族较为接受的埋葬方式,但是身为女真上层的帝后王公则较少适用这一方式,其最为接受的还是尸骨葬,符合汉族伦理文化传统。但火葬本身在金代的早期向中后期也发生了质的转变,由土坑火葬到石函火葬盛殓,这是女真旧俗向新的埋葬方式的一种转变,其间渗入了很多中原汉传佛教文化的因素,亦可称其为丧葬习俗汉化的一个表征。

第四,从墓内陈设和随葬品上,越来越多地使用专为墓葬而设置的随葬品和表现墓主人价值追求的墓葬内的装饰与布局。诚如(一)中所言,早期作为汉化表征的随葬品多为战利品,而在金中后期以来,逐渐显现出专为随葬而做的,体现汉文化特色的“明器”。如睿陵陪葬墓 M5 磁州窑龙凤纹瓷罐和 39 枚“泰和重宝”厌胜铜钱^[18],北京乌古论元忠墓中的 1 枚长命富贵压胜钱^[15],完颜晏、完颜希尹墓和完颜之墓出土的买地券,睿陵地宫出土的龙凤纹雕刻石椁,都很好地反映了女真贵族自身对于汉族宗教观念、鬼神认识和等级尊卑的理解与认同。

通览有金一代女真墓葬宏观规制与微观陈设的变化,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女真墓葬由小规模、浅层次地吸收借鉴汉民族文化元素到大范围、深程度地

将汉文化元素与女真文化有机地糅合到一起的全过程,这与其民族及民族文化本身与汉民族及汉文化的融合是相辅相成的,墓葬习俗的嬗变是女真民族汉化的一个重要表征。女真人汉化已是学界公认的学术观点,女真的汉化体现在女真人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笔者以丧葬习俗作为切入点,自知难以窥见其汉化的全貌,但却为女真汉化问题的论述开拓一条研究思路,为已有观点提供有力的佐证。同时,不应忘记宋辽金时期,中国“局部统一,整体分裂”的现实背景。深入分析当时北部中国文化的双向流动至关重要。女真汉化已成定论,但北方汉文化对于女真文化的吸收也不容忽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是构成今日汉族内部文化多元性乃至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多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一个直接渊藪,值得日后进行深入地探索,从而为今日深度挖掘民族文化的有益成分,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言献策。

① 本文根据《国务院关于东北地区振兴规划的批复》(国函[2007]76号),采取东北地区广义的定义,即东北地区包括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通辽市、赤峰市和锡林郭勒盟(蒙东地区)。

② 天德元年十二月(1150年1月)乙亥日海陵王为完颜宗干追上谥号为“宪古弘道文昭武烈皇帝睿明皇帝”,庙号为“德宗”。海陵王被杀后第二年,即金世宗大定二年(1162),完颜宗干被除去庙号,改谥号为“明肃皇帝”。金世宗大定二十二年(1182),因其子海陵王在两年前被废为“海陵庶人”,其谥号也被削去,封为“皇伯、太师、辽王”,谥“忠烈”,妻子诸孙皆从降。金章宗明昌四年(1193),配享太庙。

③ 睿陵共有 5 座陪葬墓,分别记作 M1、M2、M3、M4 和 M5。因 M1~M3 三座墓葬遭到破坏,未见葬具、人骨和随葬品,没有考究价值,遂不作赘述。

参考文献:

- [1] 宇文懋昭.大金国志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2] 范曄.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3] 刘昫.旧唐书:卷一九九(下)[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4] 赵永军,姜玉珂.黑龙江地区金墓述略[J].边疆考古研究,2007(6):312-328.
- [5] 干志耿,魏国忠.绥滨三号辽代女真墓的清理与五国部文化探索[J].考古与文物,1984(2):59-70.
- [6] 庞志国.1979年—1980年间完颜希尹家族墓地的调查与发掘[J].东北史地,2010(4):62-66.
- [7] 景爱.松花江下游奥里米古城及其周围的金代墓群[J].文物,

- 1977(4):56-63.
- [8] 林秀贞,张泰湘,杨志军.黑龙江畔绥滨中兴古城和金代墓群[J].文物,1977(4):40-50.
- [9] 阎景全.黑龙江省阿城市双城村金墓群出土文物整理报告[J].北方文物,1990(2):28-41.
- [10] 刘红宇,安文荣.长春市石碑岭金代墓地发掘简报[J].考古,1991(4):352-360.
- [11] 郝思德,李砚铁,刘晓东.黑龙江阿城巨源金代齐国王墓发掘简报[J].考古,1989(10):1-10,45.
- [12] 刘精义,张先得.北京市通县金代墓葬发掘简报[J].文物,1977(11):9-16.
- [13] 丁利娜.北京地区金代墓葬概述[J].文物春秋,2009(4):26-31.
- [14] 秦大树.北京市海淀区南辛庄金墓清理简报[J].文物,1988(7):56-67.
- [15] 赵福生,王武钰,袁进京.金代乌古论窝论、乌古论元忠及鲁国大长公主墓志考释[J].北京文物与考古,1983(1):73-93.
- [16] 罗平,郑绍宗.河北新城县北场村金时立爱 and 时丰墓发掘记[J].考古,1962(12):645-651.
- [17] 脱脱.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18]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金代皇陵[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69-100.
- [19] 黄晓芬.汉墓的考古学研究[M].长沙:岳麓书社,2003:255.
- [20] 李健才.金代女真墓葬的演变[M]//辽金史论集:第4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339-349.
- [21] 刘晓东.金代土坑石椁墓及相关问题[M]//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二十周年考古论文集.北京:知识出版社,1993.
- [22] 陈相伟.试论金代石椁墓[J].博物馆研究,1993(1):81-89.

A Study of the Conversion Process from Jurchen to Chinese Ethnic Based on Jurchen Noble Tombs in Jin Dynasty

LI Yujun¹, WU Dongming¹, XIA Yibo²

(1. School of historical, Culture and Tourism,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81, China;
2. College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Jin dynasty was a regime established by the Northern Minority Jurchen. In Jin Dynasty, from the Jurchen nobles to ordinary people, all tried their best to learn Chinese culture. At the meantime, Jurchen Funeral customs gradually evolved to that of the Central Plain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external shape and internal structure of the Jurchen noble tombs in Northeast and Beijing regions, a process is demonstrated for Jurchen accepting Chinese culture on funeral goods, funeral ceremony and funeral ideas. Especially after the political center was moved into the Central Plains, the use of dragon, phoenix and cloud ornamentation, the application of “Kanyu” theories, the execution of “Zhaomu” system and the reception to the idea of “all will die and return to the earth” reached an unprecedented level.

Key words: Jin Dynasty; Jurchen Tombs; cultural identity; Chinese localization

〔责任编辑:徐昭峰〕